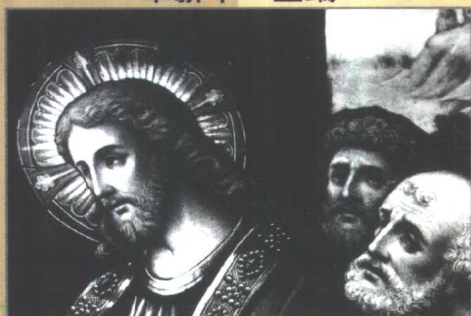


思想

《宗教与思想》丛书◇

卓新平 主编



基督教 在中古欧洲的贡献

△杨昌栋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宗教与思想》丛书/卓新平主编·

基督教在中古欧洲的贡献

杨昌栋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教在中古欧洲的贡献/杨昌栋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10

(宗教与思想丛书/卓新平主编)

ISBN 7-80149-378-8

I. 基… II. 杨… III. 基督教—影响—欧洲—中世纪 IV. B97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2488 号

《宗教与思想》丛书

基督教在中古欧洲的贡献



著 者: 杨昌栋

责任编辑: 何炳济

责任校对: 闫晓琦

责任印制: 同 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美通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1.5

字 数: 236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378-8/B·054

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宗教与思想》丛书

● ● ● ● ● ● ● ● ●

总 序

宗教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出人的超越自我和信仰追求。宗教属于人的灵性世界，是对宇宙奥秘、自然奥秘、生命奥秘的永恒之问。在这种询问中，我们看到了人之精神向往、灵性需求和本真信仰。因此，宗教正是人在信仰中的生活、体验、思索、感悟、行动和见证。宗教所展示的乃人类文化大树上的一朵灵性之花，从其闪烁、迷离的花影中我们可以依稀辨认出人的上下求索、人的时空漫游、人的心醉神迷、人的超凡脱俗。作为穿越永恒与现实、无限与有限之间的精神飞舟，宗教表达了人的叹息、惊讶、不安和渴求。宗教具有的这种神秘感、惊奇感和超越感，揭示出人之灵性秘密，试说着人的文化真谛和人的生命意义。诚然，宗教表现了精神、心灵之浪漫，但它作为信仰之在、信仰之感和信仰之思而体现出的强大生命力和久远流传，却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深入研究。

在当今社会，对宗教的认识研究和理解诠释已在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系统开展，对其“形”、“神”之捕捉和勾勒亦颇有成就。人们在“究天人之际”、“神人结合”之关系上，在“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理解上已窥见到宗教的一些基本特征，并且从哲学、人类

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层面探究解释了“神道设教”这一神秘而复杂的精神领域，推出了种种界说和理论。然而，对宗教的这些认识和理解仍是初步的、多元的，因其初步而需要更深入、更系统和更全面的研究，因其多元而需要不同见解之间的互识、互补、互镜和互证。我们这里编辑出版的《宗教与思想》研究丛书，也是要说明并进而证实这一探究的开放性和持久性。为此，在这套丛书中，我们将逐渐推出当代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相关外文学术名著的翻译引进，以及 20 世纪上半叶问世的一批学术精品的整理再版。

宗教与思想的关系是千百年来中外思想家们反复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它为当代人的研究提供了广远的领域，亦需要其研究者具有宽阔的视野。在此，宗教与思想不仅仅论及人之“信与思”的关系，而且也涉及到人之“在与思”、“情与思”、“灵与思”等关系。人的存在是极为复杂的存在，人的本性包括性、情、意、智等诸多方面，这在宗教中均有体现。宗教与思想自然包括信仰与理性的关系，我们可在西方宗教思想史有关“信仰而后理解”、“理解而后信仰”的争论上见其端倪。然而，其论域及其引申又远远超越其限定。从宗教认知来看，人不仅具有理智和理性，而且也具有心智和灵性，“心灵”这一表述由此说明了人之理性认知的局限，以及人之信仰把握对纯理性思维的超越。正如帕斯卡尔所言，“人心有其理智，那是理智所根本不认识的”，“我们认识真理，不仅仅是由于理智而且还由于内心”。这种“心灵”或“心智”乃人之精神的奥秘所在，它表述了人的体验、人的感悟、人的惊讶和人的超越。所以，宗教之思乃是形象思维、意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综合及结合，它说明了人之精神生活的丰富与复杂、深远与博大。

此外，如果说科学知识体现出理性的智慧，那么科学精神则不仅仅指理性精神。它也包括人之灵性中还具有的好奇、惊讶、想象、神往和超越等精神。宗教与科学在思想境界上的这种相遇，在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身上得到了典型表述。同样，中外科学家与宗教思想家如帕斯卡尔、张衡等人的思与行，信仰与实践亦给我们留下了重要的思绪和启迪。因此，我们应展开的对宗教与思想之探就不仅仅是宗教与哲学的研究，而且也包括宗教与科学、宗教与文学、宗教与文化、宗教与艺术、宗教与社会、宗教与伦理、宗教与法律、宗教与历史等领域，有着更大的涵盖。总之，我们应展示古今中外人类精神贤哲大德的思想睿智和灵性境界，介绍各种视域的所思及所获。而且，这种宗教研究的开放性亦可在“思无涯”之表述上得到印证。

对宗教与思想的认识，是对人之存在及其意义的认识；而对宗教灵性的理解亦是对自我人性的理解，是对人类及其生存时空的理解。由此可见，我们要展开的研究乃旨在一种对话，一种古今中外的对话，一种理与信、智与灵、道与言、我与你的对话：对话以求理解！对话才是人类共在之智慧。或许，这是一场没有结局的对话。但我们并不奢求某种具体的结果，而只希望有更多对话者的参与，以参与对话来参与我们所遇的世纪之交，参与一种灵性认知上的送旧迎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让我们以这种心境和胸怀来参与探究人的灵性之旅，这样，真诚的对话将不会结束，客观的研究则没有穷尽、求知的追求亦永无止境。

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

卓新平

本书序



对于欧洲中世纪的评价，在史学界一直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在西方学术史上，15 世纪的一些人文主义者对中世纪的发展持蔑视态度，他们崇尚古代希腊罗马文化，提出“回到古代去”这一口号，认为自己乃真正继承和发扬了古代文明传统。与之相对比，他们把 5 世纪罗马文明的毁灭到 15 世纪其人文主义文明兴起之间的千年视为西方文明史上的“空白”，故称其为“黑暗时代”。由此，欧洲中世纪乃“黑暗的”、“野蛮的”和“文明倒退的”时期，乃“千年黑暗”之说得以流行。而随着 16 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基督宗教内部又形成新教与天主教的对立，新教对天主教的过去尤其是中世纪的经历亦持否定态度，因此在基督宗教内部亦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古欧洲乃“黑暗时代”之说。这种影响乃延续至今，并造成人们在认识中世纪欧洲发展上的种种错觉、误解和混乱。

20 世纪初，西方史学界对中世纪欧洲的研究出现突破。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哈斯金斯 (C.H.Haskins) 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开始深入研究以“12 世纪”为中心的中世纪种种文化复兴现象，推出了《中世纪科学史研究》(1924)、《12 世纪文化复兴》(1927) 和《中世纪文化研究》(1929) 等重新评价、充分肯定欧洲中世纪

文化发展的著作。这些新发现和新观点为欧洲中世纪历史展示了与传统认知迥异的全新景观，而“12世纪文化复兴”则不仅成为一种专门的史学术语、更成为20世纪史学研究上的一门显学。

与传统观点尤其是上述人文主义者否定中世纪历史的见解不同，20世纪上半叶的这批史学家摒弃了中世纪乃“千年黑暗”之说，认为以基督宗教（天主教）占主导地位的欧洲中世纪历史乃西方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它上承古希腊罗马文化、下导近代欧洲乃至整个西方文化，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有不可磨灭的地位和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些学者还从天主教对欧洲社会的重建、“加洛林文化复兴”、“12世纪文化复兴”、“欧洲大学的兴起”、“中世纪实验科学”、“13世纪经院哲学的鼎盛”等方面加以具体分析和论述。从此，对欧洲中世纪的评价峰回路转，呈现复杂、多元之势。

颇有意义的是，中国基督宗教的新教学者杨昌栋先生在这一时期亦独辟蹊径，针对当时在中国仍非常流行的中古欧洲乃天主教统治的“黑暗时代”之说而想问个究竟、探个明白，一头钻进欧洲中世纪社会思想文化的研究之中，以便对中古欧洲及其教会“能下一个更广深、更精密、更公平的研究和判断”。他于1930年便完成了《基督教在中古欧洲的贡献》这部著作，对基督宗教在中古欧洲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生活各方面的贡献进行了系统研究和全面阐述，因而乃代表中国学界对当时世界史学界研究中世纪欧洲的学术新潮流作了意味深长的回应。这部著作的完成在中国基督宗教界亦获得好评，几经补充、修改后被收入《燕京宗教学院丛书》，于1936年在上海博物院路广学书局出版。时隔60多年，我们看到中国史学界对中古欧洲的研究仍很滞后，罕有新著问世；而被世界史学界早已

匡正的一些错误评价和过时之说似在中国学界和社会亦仍有影响、仍在坚持。为此，我们深感有必要再版杨昌栋先生的这部著作，期望人们能冷静地读读杨昌栋先生对中古欧洲的分析与评说，更盼能以此推动中国当代学界在欧洲中世纪研究上的发展和突破。为了保持历史原貌和杨昌栋先生的文风，我们除了对此书印刷上的一些错误加以修正之外，在行文、语气上未加任何改动。读者若有不习惯之处，尚请理解和谅解我们的处理。

杨昌栋先生为福建平潭县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出生于梧井村（今苏沃镇），5岁起读私塾，14岁到福清融美学校就读，17岁入福州格致书院，后格致书院并入福建协和大学，于1925年初在该校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此后曾回平潭开宗中学任校长，同年秋入燕京大学攻读神学，以《基督教在中古欧洲的贡献》为题撰写论文，于1928年获神学硕士学位。杨昌栋先生毕业后在平潭基督教苏沃教堂任牧师，1930年应聘任福清龙田融美中学校长，1933年秋赴美国新泽西州耶鲁大学留学，一年后获社会学博士学位。杨昌栋先生于1934年学成回国，曾任福州协和农业职业学校校长，1938年兼任福建协和道学院院长，1941年任福建卫理联中校长，1942年秋专任道学院院长，1945年秋任福建协和神学院院长，1947年夏出任福建协和大学代理校长，1949年5月再次赴美进修，1950年秋回国后担任卫理公会福州年议会主席、福州天安堂主任牧师、1954年参加全国基督教代表会议，1956年以来先后担任福州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一、二、三届副主席，福建省第一、二、三届基督教三自爱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基督教协会委员，1981年任福州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总干事。杨昌栋先生还曾当选为福州市政协委员、福州市人民代表，

任福建省文史馆馆员。1983年，杨昌栋先生病逝，享年86岁。

此书的出版得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亦得到雷立柏博士的积极推荐和支持。杨昌栋先生的子女杨运安老师曾帮助询问版权情况，福建神学院的江雪芬老师亦热情帮助了解情况、提供资料。对于这一切帮助、关心和支持，我们在此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卓新平

1999年11月24日 于望京德君斋

编审者卷头言



本书著者杨君昌栋，福建人，先肄业于福建协和大学文学院，1925年来燕京，入宗教学院及研究院肄业，得神学士，与文学硕士学位。他来燕京时，我虽任职宗教学院院长，然事忙多病，除功课外，未能与同学们多接近。翌年我得休假一年，赴欧美出席各种国际宗教会议，并在美国各大学讲学，因一年工作不能完结，继续一年，返国时杨君已卒業离校了，因此我与杨君不甚相熟。然我从同事中听见，知道杨君在校很得同学与师长的器重，因为他为人朴实诚恳，为学又勤奋而专精。本书是他毕业的论文。1931年，宗教学院教授会，推赵君紫宸与我同负宗教学院丛书编审之责，我才得读此书之原稿，决定当收入本丛书中。赵紫宸教授因去年多病，继而值假期到了，赴英留学。编审事便由我一人负责。杨君原稿，未曾用楷书誊清，付印时，校对十分困难，杨君又远在闽中服务，无从接洽。全书原稿的文辞，曾由燕大文学院国文系主任郭绍虞先生校订一番，此次付印校订时，我也随处修改一点。但我总觉得虽经过几手的修改，文辞上不能十分流畅的地方依旧不少，因为所引用材料，都是西文的，翻译本来就不容易。校对的错误处也免不了，希望读者随时指正，以便再版时可修改。

著这书的原委，著者已在著者自序中说明；本书的贡献，郭绍虞先生在他的序中也已说得透切，我不必赘言了。我要补充的只有两点：

一，本书是在北平著的，北平参考书籍之丰富，虽比我国国内各处都占优胜，然而西文书籍却十二分有限，我希望杨君自己，或其他同志，能得机会赴欧洲研究这问题，广搜材料，使本书更能充实。

二，本书是著者原定计划之半，其余半部（1）论基督教在中古欧洲之知识生活的贡献，与（2）基督教在中古欧洲之美学生活的贡献。因为时间的限制，著者未曾下手。这也是使我们对著者及其他同志起很深切的希望，因为这些问题都是很值得研究的，在华文著述中，还未有专书。

这几年来，我国青年，在各种互相猛烈冲突的思潮洪流中，很难得着真理的指南针。对于许多问题，未能多得真实学者的细心的指导，作切实的研究，求公允的结论。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不但被人攻击到体无完肤，而且往往横遭不近人情之诬蔑。基督教向来是不怕人攻击的，然而一般青年，被利用宣传达到特别作用的目标者所迷惑，实在是很令人可惜。信基督教的人，欢迎根据事实的批评，因为真基督徒是信真理的人，真理是不怕批评的。我相信此后中国有一天政治清平，学术界得安心努力研究一切问题，青年学生不被有作用者旦夕所愚弄，真理必有昭明的机会。杨君本书所讨论的，正是许多青年所要讨论的问题。虽然本书的成绩，因为时间及材料的限制，贡献是有限。然而这本书却是华人研究宗教史很大胆很诚恳的一部“处女作品”，一本尝试集。这本书将要成为我国未来学术界的一个小哥伦布。接踵而到新大陆的，将来必有多数的有志青年，他们的发现与建设，比这本尝试集更伟大更重要，

是可预料的。

本书校刊时王克私教授，帮忙我校阅西文，我的助理吴君其瑞，郑君震寰，也曾帮助我校阅华文，谨此致谢。

民国二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校毕书

刘廷芳

燕京大学燕南园风满楼

郭绍虞先生序



一般人——尤其是治历史的——往往说破除成见，但实际上只有成见是最难破除，而治历史者更易为成见所蔽。一全部的历史，殆即是成见的记录。“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因于事业的成功与失败，而历史上遂没有真的记载了。“入主出奴，党同伐异”，因于意见的相同与相左，而历史上遂亦不见真的事实了。何况再加以作史者之渲染润饰。变其本来面目，如所谓“桀纣之恶不如是之甚”者，则欲于历史中求其信，岂非难之又难，更不用论舞词弄札饰非文过者，如《史通》所谓“曲笔”的了。史籍既难以征信，则治历史者如何可以轻易说得不为成见所蔽。

历史本所以征信而何以历史中求信之难至于如此，吾尝推求其故，大抵不外因于历史的构成最易陷于片面的记载之缘故。在某种势力或某派人主持之下，其历史无形中只替某一方面说话。久而久之这片面的说话，便成为确定的事实，于是一般人积非成是，也就根据此事实以作为永久的定论。所谓“一笔抹煞”云者，若就史笔之作用而言，真有这么般力量，但历史真实性之丧失却即基于此。

举个最近的例，如《清史稿》之成为禁书，便是最适当的例。论《清史稿》的本身，固然有很多的罅漏和缺点，但是现在所以被禁之故，则完全因与党的立场，互相冲突而已。所以以后假使站

于党的立场而编成的清史,其事实之内容必与现在的《清史稿》颇有出入。我固不满意于现在的《清史稿》,但亦不希望有党的色彩的清史或民国史。编纂党史不妨浓厚党的色彩,但不宜带有派或系的色彩,正如编纂国史,不宜带有党的色彩一样。

举此类推,则知历史的构成,每不免陷于片面的记载了。根据此片面的记载而奉为信史,这岂是治历史者应有的态度。然而盲从者多,考信者少,所以我说蔽于成见,尤为治历史者所应注意的事。

然则欲免除这片面的记载之缺陷当若何?曰:只有再从另一方面,也作他片面的记载,于是两造成讼,而读者始可作一公平的判断。昔人作史论,往往喜欢作翻案文章,实则非此翻案也,事实具在,有可以供翻案者在也。盖历史的构成,既易陷于片面的记载,则历史的本身,安得不成为久未定讞的公案?

杨昌栋君在福建协和大学时,颇致力于宗教的事业,及来燕京大学的宗教学院,又潜心于历史的研究。此书即为其研究宗教史的一部分的成绩。其最大的成功,即在不囿成见,能对于一般人所认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为之搜罗事实,列作佐证,以替这时代的教徒辨诬,以暴露这时代教徒服务的精神,以表扬这时代教徒济世的功绩,兼以看出这时代与后来文艺复兴时代的关系。此虽偏于宗教的立场,但其治史的方法与持论之公允,都是值得注意和称赞的。至少,论其最低限度的功绩,也可以供给治西洋中世纪文化史者一个另一方面的片面的记载。所以吾觉得这书不仅是对于宗教上的贡献,即其对于历史上的贡献已经很有价值了。世有治西洋史学者,当不会以此言为阿谀吧。

郭绍虞

燕京大学

自序



我因生长于改正教的家庭，所以自少对于天主教就不很满意。及进了中学，我的历史教授又常对我说，“中古欧洲即我们所谓黑暗时代；那时代为什么黑暗呢？因为天主教在那时代很操权。”自是以后，我对天主教特别是中古的天主教，变成一天比一天的仇视。人常说，“上帝怎样暗助宇宙之进步，可从历史看出来。”我因碰着中古黑暗时代的钉子，曾好些次对这话生起怀疑，以为“上帝在历史”这句话，未必没有疏漏；不然上帝的灵迹若即在历史中间，何以在历史上有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呢？

于1925年秋季，我到北京即现在的北平，我有机会读到很多排斥基督教的文章，它们常引中古教会为基督教腐坏的凭证。我读后不免叹着说：“若没有中古教会，则基督教的名誉亦不至受破坏；没有它，则基督教在今日的潮流里面，亦未必受排挤。”

我本来对中古教会不怀好感，然而因为见它被人侮蔑得过于利害，所以突然在我心中发生一种扶弱的情感；由是我遂怀疑地说：“中古教会所设施所实行的，是否只有普通人所提的几个臭的故事？这几个故事是否足以包括中古教会的全部工作？抑不过其工作之一部分？若为其一部分，则显然的另有其他部分便不容一笔抹煞了。”抹杀了中古教

会的好的事实而独举坏的事实以相诋毁，是否能得其真相。而且要估价一个制度、时代、或是人类，是否能独注重他坏的部分。我们须知对于这些估价应当适用最好的最理想的而不适用其坏的部分。比方说，这个时代的文明的进步是胜过那个时代的文明的进步；我们这样说，不是因为见这个时代的愚人，不如那个时代的愚人的愚；或是那个时代的坏人，是比这个时代的坏人更坏；乃是因为见这个时代的中坚人物：如宗教家、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等等，是比那个时代的宗教家、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高过一筹。又如我们说人为万物之灵，是因为见到人类的最高的部分；而不是注重人类最劣的部分中，所以估价中古的教会，也应用他最好的事实作标准。而且中古教会之好的事实，也正多至不可胜举，所以我就用这个标准特抽选中古欧洲一部分以为研究的题目。

研究了几个月，我觉得关于中古教会的那么多的坏的故事，有的是实的，有的是半实半假的，有的是完全没有历史根据的，考察这类没有根据或半实半假的故事的缘由，有的是因为叙述这故事的人不小心；有的是因为尊崇文艺复兴的人，不得不特意描画中古欧洲的坏，使文艺复兴的历史，才得加倍地光荣；有的是因为佩服路得的改教事业的人，他们要提高路得的地位，不知不觉地降低中古天主教会的地位。同时我又找出很多的故事，使我相信在中古欧洲什么教皇制度或是修道院运动，我们认为不对的，实在是欧洲蛮族的药石，挽回时局的最好的补剂；它，有历史的背景，因此在中古也有存在的必要。

从得了这个印象以后，复连续不断地研究了二三年，然后我觉得中古欧洲虽曾有过黑暗时代，然而总未曾有过死的时代；因为中古欧洲是富有活动，教会在中古欧洲最